

读书者说

钗黛重像的文化基因与文学创意

——品读《红楼十五钗》中的视角与新见

曹立波

《红楼梦》通过人物塑造来体现华夏雅文化,应为古今多数读者的共识。但如何体现文化之雅,评论者往往见仁见智,亦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哪些读者眼中的“哈姆雷特”,或者宝黛钗,更接近作者的理想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正如欧丽娟教授在新作《红楼十五钗》(下文简称“欧文”)前言中所云:“并不是每一个哈姆雷特都有价值,更不是凭感觉文学主义,就可以产生一个哈姆雷特。如果没有全面掌握文本内容,真正理解曹雪芹的意图,那就只能永远在故事的真相之外。更遗憾的是,你会错过靠近雅文化的机会。”

欧文以红楼人物为切入点,考察贾宝玉及正、副册诸女子,意在改变“流于世俗”的文学解读,重塑红楼女性形象,感知贵族生活的雅与美。笔者作为同好,品读《红楼十五钗》中的视角与新见,有感而发。

从人物重像到文化基因

曹雪芹植根于传统文化,塑造了千姿百态的红楼群芳。不同于我在《红楼十二钗评传》中以诗评人、以花喻人的评价方式,丽娟教授提出重像视角,即选取书中外貌性格相似者或古代文人雅士,与众金钗进行映射、类比,以重新理解红楼佳人。

书中宝黛钗等诸多形象考论多涉及重像手法,如从家族、人生、婚恋三个方面,认为贾宝玉的重像有荣国公、甄宝玉与薛宝钗。林黛玉的重像从形到神相对较多,既有“貌合”的晴雯、尤三姐,又有“情投”的妙玉、茗玉,也有西施、飞燕、娥皇女英等历史人物,用这些红颜薄命而才华出众、性情高傲的女性,来烘托黛玉的才情。相较而言,欧文偏爱薛宝钗、贾探春这类德才兼备的女子,其重像多取自古代的文人雅士。借杨妃摹钗之美貌,以孔子之“时”、屈原之“洁”、陶渊明之“雅”,言宝钗之情性,赞美其周全大体、藏拙含蓄的“山中高士”之风。贾探春为“决决大气的将相雅士”,选颜真卿、王羲之、苏东坡等名士来映衬其“才自精明志自高”的磊落人格。重像来源众多,有的借人物之口直接道出,如王夫人曾夸赞眉宇间长得像林黛玉;有的是作者在回目中心

明,如第二十七回的“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塚飞燕泣残红”;重像解读法将诸钗合成群像,丰富了个体形象的内涵,较之前人的影子说,更富有系统性。

通过“重像”,读者既可感受“本”与“像”多角度的相似性,同时也能品析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态度。拥黛还是拥钗,自清代起,读者争议不断。《三借庐笔谈》记载邹佩文和老友许伯谦,就曾因此“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几挥老拳”。拥黛者怜黛卿身世而爱其聪颖,贬钗褒之柔奸,如涂瀛称“林黛玉人品才情,为《红楼梦》最”。拥钗者多爱钗表稳重而宽厚,憎晴黛之乖僻,如王希廉评“黛玉一味痴情,心地偏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宝钗却是才有德”。近代俞平伯云:“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相下。”他提出的“钗黛合一”说,影响至今。

在钗黛拥抑的问题上,给宝钗以应有的褒扬,是值得肯定,也是达成共识的。就此,欧丽娟教授提出要打破“读者的刻板印象”,“重新理解红楼人物”,为钗黛翻案。

读者若要客观看待钗黛拥抑问题,还应回归文本寻找依据。脂砚斋曾言:“钗黛名虽两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在作者心目中,钗黛二人本无高下之分,其中蕴含着作者主张儒道兼美的审美理想。总之,红楼佳人身上兼具丰富的文化基因,由此升华为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文学意象或艺术符号。

从才子佳人到世道人心

《红楼梦》的情节虽以宝黛钗爱情故事为中心,但超越了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在佳人形象上,更凸显女儿们的独立审美价值;在主旨大意上,意在破除陈旧俗套。欧文认为《红楼梦》的主题宏大,有益于世道人心,解读《红楼梦》时要“作高一层次”,并“用学问一提”,认定其深层次的内涵应为“展示雅文化之美貌,以及最终却失落了而感伤哀婉”,并非简单地反对封建礼教。

欧文对宝黛钗爱情故事给予独到解读,认为宝黛爱情是青梅竹马友情的升华,而金玉良缘是和尚传达的天作之合的神喻,宝钗不仅与宝玉有夫妻相,而且是他真正的同道,也是其出世的启蒙者。曹雪芹在第五十八回特提“茜纱窗真情揆痴理”,让宝玉明白个人的

爱情可以安放于心中,与社会责任并不冲突。因此后文金玉良缘取代木石前盟乃有伏笔在先。后40回中“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所设计的情节是违反小说家原意的。

回归文本可以得知,小说中宝钗有玉,宝钗有金锁,湘云有金麒麟……第五十七回宝钗得知探春给邢岫烟玉佩后,说道:“他见人皆有,独你一个没有,怕人笑话,故此送你一个。”众姊妹都有的装饰品,为何唯独黛玉没有?宝黛二人初见就发生了一场金玉之说耿耿于怀,种种笔墨墨迹非虚。作者用金玉指代世俗标准下物质联姻的婚姻生活,而木石前盟则代表着心相印的纯真爱情,综合全书考虑作者是否意在以无待有情?《庄子·逍遥游》篇中“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好似宝黛木石前盟超越物质的知己爱情。通过对比营造“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爱情理想,此乃作者突破中国才子佳人小说婚恋情节的创新之处。

作者用史笔将真事隐去,构建出的大观世界,寄托着曲折幽深、内涵广阔的主旨大意,其中不仅包括人生价值的毁灭,爱情理想的破灭,众女子青春与美的陨落,还包括贵族家庭没落的悲剧。秦可卿是众女子中情节设置少而全,也令人困惑的一个人物形象。她属于兼容钗黛的“重像”,但欧文的解读,似与文本存在距离。欧文批驳秦可卿,认为可卿乃皇家出身的说法“已经脱离了文本,完全缺乏小说本身的证据,何况清朝的历史上也没有类似的记载,等于是另外编造出来的故事,所以不宜相信”。这一观点尊重文本与历史,是客观的。那么秦业为何收养可卿?欧文的解释是:“秦可卿本就是秦业自己的私生女……明白了这段隐情以后,便不要再穿凿附会,也不要再用弃婴来解释秦可卿的性格和处理了”。从批驳秦可卿出发,欧文对“隐情”的主观追溯,似存在步入一种另类“穿凿附会”的趋势。笔者以为曹雪芹意在通过写秦可卿作为养生堂抱来的女婴,这种难知父母的身世背景,突出其与宝玉有夫妻相,而且是他真正的同道,也是其出世的启蒙者。曹雪芹在第五十八回特提“茜纱窗真情揆痴理”,让宝玉明白个人的

作者的艺术创意。深刻的艺术家总是试图揭示人性,反思他们所处的世界、社会及其自身,因此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够反映世道人心,甚至上升到哲学层面,给人以启迪。

从文本阐释到传播发展

《红楼梦》中形象鲜活的艺术生命、曲折细致的故事情节,带给读者以美的享受。欧文在鉴赏时的语言风格也独具特色,其中既体现着作者新颖的欣赏角度,同时也折射出文本阐释的多重魅力。

以冷香丸为例。欧文认为冷香丸用来治疗宝钗“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它全部药材用“十二”作为重量单位,象征着涵盖所有金钱的悲剧命运,同时“冷”为“冷静”,“香”是美好芳香的意思,用来暗示宝钗高洁的道德情操。

作者用清一代百余年的《红楼梦》传播史,由活字、木刻到石印、铅印,印刷技术不断更新,读者对《红楼梦》的需求也不断增多。由白文到增评、汇评,版本内容逐渐丰富,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上述诸多印本,皆是以120回本的形式刊行的。因此仅就“截长补短”和“补遗订讹”写出全书中事件及主要人物悲剧结局,并“付之梨枣”而言,含有后40回的本无疑功大于过的。

基于不同版本的品红文章章异彩纷呈,尽管千人千解,对于红楼文化之雅的认知则有共鸣。在《红楼梦》版本的动态轨迹上,每一阶段犹如月亮的阴晴圆缺,各美其美。那么,文本研究是否亦应客观包容,美美与共呢?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授,2020年北京市民族艺术学高精尖学科项目【ART2020Y03】成果)

谭凤嫒画 选自《红楼十二钗评传》

度规范机制以强化价值共识的制度保障,完善实践养成机制以推进价值共识的落地生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六大主要机制是学习实践机制、文化熏陶机制、心理疏导机制、行为养成机制、价值评价机制、奖惩激励机制。认为只有建立健全这些机制,才能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真正做小、做细、做实,才能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富有实效性。这些见解和建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文化价值多元多变的时空背景下,凝聚当代中国价值共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振奋中华民族精神,勠力同心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从理论、历史、现实三者统一的整体维度,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和新的阐释,是一部有理论见解、学术创新和现实意义的精品力作。

(作者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吾观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诀,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则岂惟不避而已,又必于本不相犯之处,特特故自犯之,而后从而避之。……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的这一段名言,本来是评论文学创作不能一味求异,同中见异才更见高明。以之评论学术研究,也颇为贴切。

学术研究当然要重视选题的新颖,但经常是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想法,检索学术史,却发现他人已着先鞭。未来的学术研究,恐怕拼的不仅是选题的新颖,更重要的是要拼研究的深度、广度与高度。真正高明者其实不惧选题相似,以更高的眼界和更敏锐的洞察力,将相似的选题做得更深入、更有境界,大力推进学术史,遂能避雷同而推陈出新,此即类于金圣叹所言“犯之而后避之”。

彭玉平教授的治学,固多新创领域,但尤擅“犯之而后避之”。他的《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研究的对象是词学热点人物况周颐,能对况周颐的词学本体理论、修词观及批点实践、创作业绩、文献考索、生态考察及其影响之下的词学因缘,均作深入的文献考索和理论阐发,使全书14章,章章不乏创见,殊为难得,其对学术史的深度开掘值得充分重视。比如作者发现况周颐的“重拙大”关系实有矛盾之处,追求“万不得已”之词心及“烟水迷离”之境,其间有着独特的结构谱系,与王鹏运此论原本推尊的“南渡诸贤”的运实有矛盾之处。况周颐在表面彰扬“重拙大”的同时,却暗中将对印学、书学、画学等移植过来的“松秀”说,赋予了自然清疏,平等的词内蕴,此虽为自然清疏暗流,却悄然接续着词体的本色观念。况周颐的“诗余”论,认为词之情文节奏皆有不同于诗的独立文体价值,并非由诗降格以成,是一种崇尚词体而反对传统“诗余”解说的“赢余”论,有力拓展了传统“诗余”说的理论内涵。王鹏运词学与况周颐词学,以前多将词学为对立面,但仔细对比,发现他们在“清疏沉着”这一关于词之基本特性上有着合流迹象。况周颐曾为刘承干代撰《历代词人考略》,此由今存刘承干日记以及上海图书馆所藏刘承干与况周颐、朱祖谋等人往返信件可得证实,此书不仅更能代表况周颐真实的词学主张,而且书中梳理的词人源流、生平小传、词风评价,实际上构成了现代词史和词学史的雏形。如此等等,可谓新见迭出,触处生春。况周颐研究看似难以触处生春,彭著却犯而能避,将况氏研究及民国晚清词学研究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所谓“高明之思”,指思想要具有理论高度,思考问题能站在全局或通观的立场,这样在面对同样命题时不致矮人当场,人云亦云,而能透射思想的锐利和眼光的独到,自成一派之说。比如前人探究况周颐词学理论,多围绕“重拙大”“词心”“词境”花费工夫,很少注意到《蕙风词话》《历代词人考略》中包含着其他诸多新颖的词学观念,彭著则别具只眼,拈出“松秀”说、“哀感顽艳”说、“潜气内转”说、修词观等,极大丰富了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和词学格局。如“松秀”说,上引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欲造平淡,当自组组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中”之语,复辨其丰厚、宽、自然、疏俊、风度等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松秀“以自然为底蕴,侧重笔法张弛有度,强调传达清动之气,主要体现在字面音韵与结构脉络中”。这既是况氏词学研究的一大创获,也为中国词学增添了一个新的范畴和术语,意义非凡。其实即使“重拙大”“词心”“词境”等看似耳熟能详的术语,学界也多打叠扣拙,雾中观花,彭著则能从况周颐词学整体来思考,在词史源流中确立其位置。如他指出晚清与宋末相似的“末世”情怀与审美特点是“重拙大”说提出的现实背景,故况周颐以梦窗词为切入点而臻清真浑化之境,近契晚清风行南北的梦窗词风,但与况氏整体

当然,再高明的理论,如果只是从理论到理论,停留在较虚的抽象辩证的层面,其意义也是有限的。如何有效避免空中楼阁,陷入“彼亦一非,此亦一非”的窘境,则非筑之于“情境之实”不可。所谓“情境之实”,不仅指文献的征实,而且指文献语境与生命情感的真正还原。一方面要对原著、原文或某一具体观点有忠实而深度的了解,一方面要对研究对象有“了解之同情”,体会其矛盾之处和言外之意,如此才不致扭曲或遮蔽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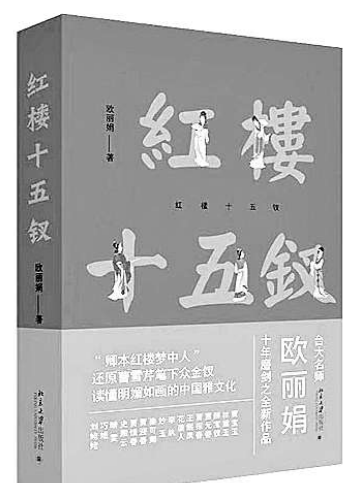
仍以况氏最著名的“重拙大”为例。彭著注重从文献和学缘两方面清理其发展流变,细析况周颐立文体的价值,并非由诗降格以成,是一种崇尚词体而反对传统“诗余”解说的“赢余”论,有力拓展了传统“诗余”说的理论内涵。王鹏运词学与况周颐词学,以前多将词学为对立面,但仔细对比,发现他们在“清疏沉着”这一关于词之基本特性上有着合流迹象。况周颐曾为刘承干代撰《历代词人考略》,此由今存刘承干日记以及上海图书馆所藏刘承干与况周颐、朱祖谋等人往返信件可得证实,此书不仅更能代表况周颐真实的词学主张,而且书中梳理的词人源流、生平小传、词风评价,实际上构成了现代词史和词学史的雏形。如此等等,可谓新见迭出,触处生春。况周颐研究看似难以触处生春,彭著却犯而能避,将况氏研究及民国晚清词学研究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况周颐天赋词心,正在清艳疏朗一路,而这种词风落脚点其实也在五代北宋,只是因为青年时受到前辈如端木采、王鹏运等的谆谆告诫,才不得不在痛苦思考五六年后转变词风,也同样使得他在撰述词话时,也处于前辈教导与内心信奉的矛盾之中。他敬重端木采、王鹏运等人,但无法从观念上全力追随,所以只能在诸种实名词话中将“重拙大”等说悬为标杆,但在20余年不断出新的词话中,其实也一直无心对“重拙大”说有更多发明,只是在托名的一种标签存在而已。而在托名的《考略》等著作中,则再无心心理顾忌,直归本心。

这种分析综合运用文献学、文艺批评学、性格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以静态的文献考索为动态的生命体贴,使人得以辨明主流词话与况周颐自身词学之间的差距及其错位,更好地从整体格局上了解晚清民国词学的主流与潜流、贡献与局限、体系与矛盾等,阅之但觉情境俱实,实有起况氏于九原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追求高明之思与情境之实,似乎是彭玉平教授一以贯之的治学特点。他稍前的一部力作《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研究的对象是更为热门的人物王国维,同样不仅有文献上的追根穷底和情境还原,更有理论上的高屋建瓴和深入研判。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红楼十五钗》 欧丽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蕉荫社 谭凤嫒画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字里行间频现学术创新 ——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沈壮海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近年来理论界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党的十九大之后,理论界围绕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如何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作用、如何充分发挥法律和政策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保障作用、如何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示范作用、如何充分发挥家庭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基础作用等问题,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作了多层面的展开研究,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武汉大学袁银传教授等撰写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就是其中富有鲜明学术特色、有重要理论创新和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读完洋洋洒洒的66万字,感觉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和学术创新。

第一,提出了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和与时俱进的问题。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

光明书话

张剑

高明之思与情境之实

读《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

张剑

“吾观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诀,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则岂惟不避而已,又必于本不相犯之处,特特故自犯之,而后从而避之。……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的这一段名言,本来是评论文学创作不能一味求异,同中见异才更见高明。以之评论学术研究,也颇为贴切。

学术研究当然要重视选题的新颖,但经常是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想法,检索学术史,却发现他人已着先鞭。未来的学术研究,恐怕拼的不仅是选题的新颖,更重要的是要拼研究的深度、广度与高度。真正高明者其实不惧选题相似,以更高的眼界和更敏锐的洞察力,将相似的选题做得更深入、更有境界,大力推进学术史,遂能避雷同而推陈出新,此即类于金圣叹所言“犯之而后避之”。

彭玉平教授的治学,固多新创领域,但尤擅“犯之而后避之”。他的《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研究的对象是词学热点人物况周颐,能对况周颐的词学本体理论、修词观及批点实践、创作业绩、文献考索、生态考察及其影响之下的词学因缘,均作深入的文献考索和理论阐发,使全书14章,章章不乏创见,殊为难得,其对学术史的深度开掘值得充分重视。比如作者发现况周颐的“重拙大”关系实有矛盾之处,追求“万不得已”之词心及“烟水迷离”之境,其间有着独特的结构谱系,与王鹏运此论原本推尊的“南渡诸贤”的运实有矛盾之处。况周颐在表面彰扬“重拙大”的同时,却暗中将对印学、书学、画学等移植过来的“松秀”说,赋予了自然清疏,平等的词内蕴,此虽为自然清疏暗流,却悄然接续着词体的本色观念。况周颐的“诗余”论,认为词之情文节奏皆有不同于诗的独立文体价值,并非由诗降格以成,是一种崇尚词体而反对传统“诗余”解说的“赢余”论,有力拓展了传统“诗余”说的理论内涵。王鹏运词学与况周颐词学,以前多将词学为对立面,但仔细对比,发现他们在“清疏沉着”这一关于词之基本特性上有着合流迹象。况周颐曾为刘承干代撰《历代词人考略》,此由今存刘承干日记以及上海图书馆所藏刘承干与况周颐、朱祖谋等人往返信件可得证实,此书不仅更能代表况周颐真实的词学主张,而且书中梳理的词人源流、生平小传、词风评价,实际上构成了现代词史和词学史的雏形。如此等等,可谓新见迭出,触处生春。况周颐研究看似难以触处生春,彭著却犯而能避,将况氏研究及民国晚清词学研究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所谓“高明之思”,指思想要具有理论高度,思考问题能站在全局或通观的立场,这样在面对同样命题时不致矮人当场,人云亦云,而能透射思想的锐利和眼光的独到,自成一派之说。比如前人探究况周颐词学理论,多围绕“重拙大”“词心”“词境”花费工夫,很少注意到《蕙风词话》《历代词人考略》中包含着其他诸多新颖的词学观念,彭著则别具只眼,拈出“松秀”说、“哀感顽艳”说、“潜气内转”说、修词观等,极大丰富了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和词学格局。如“松秀”说,上引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欲造平淡,当自组组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中”之语,复辨其丰厚、宽、自然、疏俊、风度等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松秀“以自然为底蕴,侧重笔法张弛有度,强调传达清动之气,主要体现在字面音韵与结构脉络中”。这既是况氏词学研究的一大创获,也为中国词学增添了一个新的范畴和术语,意义非凡。其实即使“重拙大”“词心”“词境”等看似耳熟能详的术语,学界也多打叠扣拙,雾中观花,彭著则能从况周颐词学整体来思考,在词史源流中确立其位置。如他指出晚清与宋末相似的“末世”情怀与审美特点是“重拙大”说提出的现实背景,故况周颐以梦窗词为切入点而臻清真浑化之境,近契晚清风行南北的梦窗词风,但与况氏整体

当然,再高明的理论,如果只是从理论到理论,停留在较虚的抽象辩证的层面,其意义也是有限的。如何有效避免空中楼阁,陷入“彼亦一非,此亦一非”的窘境,则非筑之于“情境之实”不可。所谓“情境之实”,不仅指文献的征实,而且指文献语境与生命情感的真正还原。一方面要对原著、原文或某一具体观点有忠实而深度的了解,一方面要对研究对象有“了解之同情”,体会其矛盾之处和言外之意,如此才不致扭曲或遮蔽前人。

仍以况氏最著名的“重拙大”为例。彭著注重从文献和学缘两方面清理其发展流变,细析况周颐立文体的价值,并非由诗降格以成,是一种崇尚词体而反对传统“诗余”解说的“赢余”论,有力拓展了传统“诗余”说的理论内涵。王鹏运词学与况周颐词学,以前多将词学为对立面,但仔细对比,发现他们在“清疏沉着”这一关于词之基本特性上有着合流迹象。况周颐曾为刘承干代撰《历代词人考略》,此由今存刘承干日记以及上海图书馆所藏刘承干与况周颐、朱祖谋等人往返信件可得证实,此书不仅更能代表况周颐真实的词学主张,而且书中梳理的词人源流、生平小传、词风评价,实际上构成了现代词史和词学史的雏形。如此等等,可谓新见迭出,触处生春。况周颐研究看似难以触处生春,彭著却犯而能避,将况氏研究及民国晚清词学研究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况周颐天赋词心,正在清艳疏朗一路,而这种词风落脚点其实也在五代北宋,只是因为青年时受到前辈如端木采、王鹏运等的谆谆告诫,才不得不在痛苦思考五六年后转变词风,也同样使得他在撰述词话时,也处于前辈教导与内心信奉的矛盾之中。他敬重端木采、王鹏运等人,但无法从观念上全力追随,所以只能在诸种实名词话中将“重拙大”等说悬为标杆,但在20余年不断出新的词话中,其实也一直无心对“重拙大”说有更多发明,只是在托名的一种标签存在而已。而在托名的《考略》等著作中,则再无心心理顾忌,直归本心。

这种分析综合运用文献学、文艺批评学、性格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以静态的文献考索为动态的生命体贴,使人得以辨明主流词话与况周颐自身词学之间的差距及其错位,更好地从整体格局上了解晚清民国词学的主流与潜流、贡献与局限、体系与矛盾等,阅之但觉情境俱实,实有起况氏于九原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追求高明之思与情境之实,似乎是彭玉平教授一以贯之的治学特点。他稍前的一部力作《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研究的对象是更为热门的人物王国维,同样不仅有文献上的追根穷底和情境还原,更有理论上的高屋建瓴和深入研判。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